

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的发展机制研究

王婧

【摘要】:传统生计不仅是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新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特、小、散、弱”的格局需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用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新型的生产结构。当前,传统生计发展存在着传统技术式微,农户组织化建设难,以及乡土工业弱等问题。为此,发展传统生计需依托自我传习、人才返乡、科技下乡等方式修复重建特色的“森林-山地”生态复合生计;扶持家庭农场,借助合作社、县域电商等新型网络化组织来整合小农户经营;并积极创建适宜的农工产业体系扭转“弱”的现实,“技术、组织、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可助力西南区域传统生计转型。

【关键词】:西南地区 传统生计 发展机制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1—0114—08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发展,绕不开对传统生计的研究。虽然,当前农业的比较效益已经到了一个低谷时代,但是传统生计对于广大的农民、农村来说,意义依然重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半工半耕”的状态将长期维持,农业虽不能为农民家庭带来足够的收入,却是一份基础性保障,承载着几亿农户的家庭就业和发展;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和已经完成、部分完成乡村工业化的东部发达农村相比,西南地区多为不具备区位优势,也缺少资源,以传统生计为主的普通农村,这部分地区应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优先考虑的对象;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生态文明价值观成为主流。在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农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已经提上日程。西南地区传统生计中包涵了诸多生态智慧,如果能传承修复这部分生态智慧,将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政策制度等相融合,中国农业经济将会迎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并可引领新一轮的社会变革。

现阶段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具有“特、小、散、弱”的特点,有传统优势,但总体经济发展滞后。“特”意指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自成体系,具有高效利用“森林-山地资源”的特点,其中以森林的循环利用、梯田(水田)的开发尤为重要。典型代表有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云南花腰傣的森林-梯田-河流的利用管理方式,哈尼族的梯田垂直利用体系,贵州苗族、侗族等民族的传统生计¹,至今还发挥着保护地方生态系统的作用。“小、散”指的是受多元复杂地理环境的影响,西南的传统生计以“马赛克分散型”的小中规模农户为主,大多不具备沿海地区的规模化、集中化农业种植条件;也意为分田到户后,农户的组织化水平

¹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南地区生态知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号: 14XJC84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婧, 女, 社会学博士,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本文所指的“传统生计”是复合型生计, 它包含了固定农耕、游耕、畜牧、采集、狩猎等生计类型不同比例、不同层次的有机组合, 是特定民族高度适应其所在的生态系统, 世代沿袭的可持续性谋生手段。

“半工半耕”的状态为年轻人外出务工, 老人、妇女留守农村务农。近 20 年, 中西部的工业化很难将农民工全部变成市民, 而农民工无法短期内完全摒除传统生计,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仍将长期存在。西南地区的传统农业生计有着自身的特点, 和北方的传统游牧、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相较, 也可称之为一套独特体系。

尹绍亭:《人与森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 12 页。

崔明昆:《象征与思维——新平傣族的植物世界》,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第 5 页。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1-25 页。

崔海洋:《人与稻田——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研究》,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很低，呈现原子化状态。“弱”指西南地区农业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不足，突出表现在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和市场对接失灵，农业和工业体系不匹配等问题较为严重。

如何发展西南的传统生计及相关产业？“特”的优势如何传承发展？“小、散”的格局如何整合改进？“弱”的局面如何扭转打破？带着这些问题，2014-2018年间，笔者先后在云南、贵州、四川的部分县域、乡镇及村落展开调查，总结现阶段西南地区亟待传承和发展的生计类型，思考当地人群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可能的技术、组织、制度设计是怎样，探索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的发展机制。下文将基于本土智慧来谈如何实现传统生计的发展，从技术、组织、产业三个层面入手，以期助力传承西南“特”的传统，转化为经济优势，突破“小散”的局限性，扭转农业相关产业“弱”的现实，为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乡村建言献策。

二、传承修复特色“森林-梯田”技术

发展传统生计首先需厘清其核心及特点。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纷繁复杂，有森林刀耕火种、水田稻作、园圃农业、渔业、林业、手工业、家畜饲养等，多数高度因适应“森林-山地”生态系统而绵延至今。“森林-梯田”技术最具代表性，包括养护利用森林和改森林为梯田（水田）。森林的养护利用体系包含了深刻的智慧，表现在：第一，培肥、积肥保证森林肥力。传统的游耕、游牧中有大量“积肥”的技术。第二，对森林、土地类型的划分，进而循环利用。如云南基诺族将土地分为三种类型进行轮歇，并以村寨为中心，将森林划分为护寨林、水源林、神林、刀耕火种地，这种认知和土壤科学普查结果高度一致^④。第三，林下种养殖、轮作和间作技术。较为普遍的有，林下种植中药材、菌类，林下养殖家禽等。轮作技术也非常发达，如多种作物混作，不同土地类型轮作。间作包括林粮、林菜、林果间作等。在森林利用方面，即使是在贵州省麻山石漠化地区，苗族的传统生计也可以巧妙地、持续利用岩溶盆地环形山脊，在石缝中寻找苗木的立地位置，通过刀耕火种帮助加速山脊从石漠化向丛林生态群落演变。

西南山地民族经营水田的历史悠久，梯田（水田）技术也非常重要。垦山为田难度大，能保留下来的梯田便十分珍贵，是代际相传的农业文化遗产。西南梯田仿天然泽生生态系统，具有林粮兼营、复合经营、生态维护等特点。在侗族居住地区，田、塘、河网、村寨的构建，是对森林生态系统高度仿生的智慧。在具体的稻作技术中，选用的糯稻品种，既可抗风险、减灾、防灾，也可规避梯田脱水，保证“小水库”生态功能。梯田中有稻鱼鸭共生模式，充分利用各种生物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和谐共存。一般来说，人均 1-2 亩的水田就可以满足一户四口之家的基本口粮，不会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过多的压力。如今，还有部分民族变换方式，沿袭传统生计方式，循环利用“森林-山地”资源，这说明传统技术依然具有生命力，不能摒弃。

现如今，“森林-梯田”的传统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逝。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典文化对森林有一种敌视，这和政治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密切相关。另一种说法是，后期与“以定居农耕文化”相关的知识体系被高度宣扬，而围绕森林、山地、草原、河谷等形成的独特的“小众知识体系”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或贬低。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曾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经济效益低的方式。随着社会快速转型、市场经济渗透，“森林-梯田”的传统技术不断丧失，陷入预想发展而又无力发展的两难境地。用现有的经济产值来说明这一问题，除去西藏为高原地区，西南其他四省的林地占到农用地面积的 50%以上，但是林业、林下经济产值却不成比例相应提高。2015 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林业产值占 4%，西南林业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 5%，仅略高于全国水平，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贵州林地占到农用地面积的 60%左右，2015 年林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5%，林下经济产值占 3.5%²。林下种养殖、轮作和间作技术大量消亡。不仅如此，关于梯田的传统技术也因经济效

²这两方面内容在本文中统称为“森林-梯田”技术。

尹绍亭：《人与森林》，2000 年，第 159-166 页。

崔海洋：《人与稻田——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研究》，第 202 页。

杨庭硕：《杨庭硕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4 页。

英]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 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 页。

王婧：《牧区的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5-190 页。

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2016 年贵州省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224-225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39 页。

益不高而备受冷落，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经营梯田，即使梯田的存续难如登天，且被视为“万年桩”，有的地方依然选择废弃，实属可惜。

表 1 2015 年全国及西南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地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全国	107056.4	57635.8	4436.4	29780.4	10880.6
西南地区	14387.2	8051.3	723.1	4830	423.2
重庆	1738.1	1033.7	60.4	542.9	74.9
四川	6377.8	3335.5	205.8	2515.6	210.5
贵州	2738.7	1772.6	137.7	665.2	55.9
云南	3383.1	1841.5	317.1	1031.0	81.7
西藏	149.5	68.0	2.1	75.3	0.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39 页。

在此剧变之际，传承并修复“森林-梯田”技术已十分迫切。要真正地传承一种生态技艺，离不开当地民族的自我传习。费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应具备对其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能力。西南地区的民族应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特别是生态文化方面，培育“生态文化自觉”，提高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和发展的能力。在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中，中国社会普遍形成一种社会性焦虑，总认为自己的传统技术不好，总希望用外来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其实学来学去，还不如回归民族的传统技术。就连美国当前用“刀耕火种”方式更新过熟森林，也是不折不扣地回归到传统的“游耕”文化生计模式。虽然中国很多地区无法回到刀耕火种、游耕，但是传统技术中将林业和农业结合利用、轮歇、轮作、积肥的技术依然可以沿用。现阶段，西南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生态文化自觉”现象，或开始重视民族生态文化，或收集、创办自己的“民族博物馆”，或发展传统重要生计，有的已经具有十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人才返乡，为传统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发展本土技术方面，大多数地区要么聘请外地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要么依托本地的农户、组织来示范，运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外来技术因种种原因难以融入当地，也难以精准地把脉当地资源，本地的农户、组织却在技术能力、运营管理方面又无法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在城市里务工习得先进技术的人才返乡创业，将传统技术和现代科技有效结合，有助于发展本土技术。不少县域政府已经意识到，把大学生及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抓。西南地区不乏这样的案例，如笔者在贵州黔东南，看到返乡创业者俞某，其母亲为草药师，从小耳濡目染，对家乡的生态环境、传统技术颇为了解。高中毕业后，他去黑龙江一带种植花卉，创建苗圃园，积累了丰富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2011 年回到家乡后，他针对地方生态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本土技术。如创新试种当地品种布富娜（苗语），亩产 4000-5000 斤，当时市场价为 20 元一斤，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带动当地老百姓种植新品种。

技术下乡，是改造传统生计的重要途径。对于某些农村来说，自生创新动力不足，急需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技术革新。在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过程中，需注意将传统技术转变为中间技术。中间技术既继承了传统技术中的精髓，又能超越原有技术的生产力，集合了较好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容易和当地社会的生产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易于被劳动者所掌握，是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组织形式易于采纳的方式³。同时，中间技术成本低廉，对于风险等突发情况也容易

³陈阿江：《次生焦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87 页。

和传统农业种植相比，花卉的种植技术更精细，难度系数更大些。

英]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145-154 页。

假设将传统技术设置为“一镑的技术”，将科学技术设置为“一千镑的技术”，可能更需要的是“中间技术”，即“一百镑的技术”。

应对。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具有精细化、小规模化、多样化等特点，与中间技术的发展维度非常契合。现阶段发展中间技术空间有很多：可着力开展“森林-山地”生态、社会系统研究，为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延续传统水田技术，因地制宜、全面升级；从广大小农户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供给更为人性化的科学技术。推进各种轻简的农业机械化，为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提供便捷，使得农村的农业生产就如同城市人种花养草一样。如果能顺势将下乡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中间技术，便可大大提升农业科学技术的效率和贡献率。

三、革新：发展新型合作组织

从地理维度上来看，传统生计呈现“小、散”格局主要是因为多元、独特的生态文化面貌，森林、山地、低丘、高原、宽谷、浅盆相间，河流、湖泊纵横。围绕着多元的生态系统，西南基层社会的资源管理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自治的。封建王朝对西南基层社会进行直接管理的成本非常高昂，多为象征性地管辖，乡村治理结构一直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依靠代理人进行治理。不仅如此，西南传统社会在每个生态单元内部的资源管理制度上是规整有序的。如建筑在梯田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云南哈尼族，其以地名连名为特征的民族氏族制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协同一致性，梯田的开挖、引水、用水、管理都有一整套家族、民族的集体管理制度。又如贵州黔东南侗族，有活路头制度、侗款制度，苗族有议榔制度，黔西北彝族的则溪制，这些不仅是民族社会内部运行的组织制度，也是维护当地生产生活秩序的管理经验。

理想的公社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渗透到了基层社会，替代了原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传统的资源管理体系受到影响。这一阶段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发展，但“一刀切”的政策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西南村落的传统生计面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农业生产又重新回到了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加诸于农村、农业的多种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生产生活发展迅猛，但承包到户、林权改革也迫使长久以来自治的地方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瓦解、失效，“森林-梯田”的集体管理制度破碎为“原子化”的农户家庭经营管理。特别是在西南的一些贫困地区，基层组织涣散，集体经济空壳化，农户家庭经营“小而散”的原子化状态非常严重。现如今国家也在培育发展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致力于推动农民的组织化，但效果却不理想，农民始终未能有效地自发形成合作共治体系。

发展现代农业中，“小而散”的农户家庭承包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农田、山林等资源均等化的同时，也加重了森林山地生态系统的碎片化，难以实现大尺度的生态效益。其次，单打独斗的小农户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环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各种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在经营规模、农业科技、市场营销、物流运输等环节占据优势，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西南贫困地区的农户更加难以参与市场浪潮。再次，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影响下，个体农户在农业生产上容易陷入消极涣散。多数依靠畜力、人力的传统小农，不再进行新的投入，有的转包给他人，土地、山林不会被转包者精心照料。据调查，西南地区城郊的一些村寨土地被撂荒的占30%-40%，偏远农村撂荒的占10%-20%。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传统生计需要小农的再组织化，用新型的合作组织来整合小农。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农场来整合小农显然是行不通的，一是生产成本低，在经济上容易陷入困境；二是村庄掠夺性，多无助于村落发展。相比之下，扶持家庭农场，借助合作社、利用电商等新型网络化组织方式来整合农户家庭经营更为可行。先谈扶持家庭农场优势及问题。家庭农场一般是指拥有中等规模的专业大户，面积大约为20-100亩，是村落中颇有能力的耕种群体，是生态自觉的新农人，科技兴农的骨干。家庭农场的优势体现在：顺应了现阶段中国农业生产的新变革，坚持了农业家庭生产经营的传统优势，有助于破解农业环境及农产品安全问题。家庭农场的社会关系根植于村庄，可以成为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目前，针对西南地区家庭农场的相关政策支持总体上较弱，部分地区存在“政策好，落实难”等问题。家庭农场应是未来政策制度制定关注的重要群体。

适当地鼓励合作社发展，将小农的生产管理规范化，并积极搭建市场，将一部分撂荒、无暇顾及的土地集中起来，高效利用，结合地方生态文化特点，实行积极的农业生产，是发展传统生计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社的功能可定位于两方面：一是代理经营市场，二是提供技术、管理指导。换句话说，合作社更多充当“市场经理”“技术总监”的角色。现阶段西南地区的合作社

从技术层面，发展传统生计，不是将“一镑的技术”变成“一千镑的技术”，而是寻求将传统与科学有效融合“一百镑的技术”。

正在快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还处于摸索阶段。有的地区误以为创办合作社是回到合作化时期，强调土地规模化、生产环节的联合，在西南地区恰恰行不通。有的地区合作社生产、管理没有规范，产品内容单一，经济效益低下，难以为继。有的地区因文化惯性，长久涣散的小农无法整合，农户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合作社流于形式。

如何发展合作社？根据现有的情况，至少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其一，新时期农民的合作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性、全方位的合作。充分激活基层政府强有力的带动作用，基于西南地方文化传统和社区本土的力量，推动农民的重新组织化，建设村社共同体。其二，挖掘、传承西南地区传统生计中的合理内核，将农户的传统生计升级为生态、经济、社会兼容的现代生产体系，并与第二、三产业相结合。据调查，现阶段的专业合作社，或是单一的农业生产，或是纯粹的乡村旅游，所产生的综合效益并不高。发展综合性农业合作社不失为一条可行道路，可作为国家引导，重点扶持的一个方向。其三，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渠道，积极做好农户与市场的衔接工作。合作社的发展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区要因地制宜。

用县域电商去改造传统生计可大大拓展传统零批销售模式，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直接促进小农增收，带动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给予西南地区后发赶超、弯道超车的机会。现阶段，西南地区的县域电商处于起步阶段，贵州、四川、云南等地均有探索，但多数县域政府缺少经验，基层农民参与度不高，都面临着如何持续办好电商等问题。县域政府的问题表现在：一是管理部门条块分割，没有系统地合力创办电商；二是忽视电商环境的培育，没有持续地深度发展电商。基层农民的问题表现在：一是不知道如何生产“好货”。优质农产品多处于原材料阶段，或因为供应链、加工链不健全，或因为质检、证照不齐全，无法大规模在网上销售。二是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参与电商环节。在品牌、包装、设计、视觉、营销等环节没有衔接好，较容易偃旗息鼓。

如何发展县域电商？首先，县域层面的行政力量非常重要。和经济足够发达的沿海县域相比，西南地区的县域市场经济较为落后，电商作为新兴产业，无法将其完全交给市场来主导，必须依托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系统地、持续地培育电商的土壤，包括电商的顶层设计、氛围营造、产业配套、人才培养、品牌建设等，同时，政府、企业、科研部门建立合作，才有可能办成县域电商。其次，农村社会与电商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电商是在城市培育出来的新事物，县域政府从沿海城市引进的电商模式很难调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现阶段急需摆脱城市思维，接农村地气，让电商扎根于农村社会土壤。基于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让广大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参与，与电商平台有效对接，打造电商平台中的好商品，形成良好的供应链，才能真正激活县域电商。

县域电商和农村社会融合方面，贵州省 L 县的俞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模式借助乡村经纪人，将千万小散农户有机地统合在一起，和县域电商平台进行有效对接。具体做法是：电商平台以中心村/乡镇为单位，在其中找到 1-2 名经纪人，经纪人既是农业技术精英，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为地方案能人。由经纪人统领该村的农户签合同。每个中心村/乡镇设立一个服务站。经纪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整合农村集散产品，引导农民规范生产，并在质检、运输等技术过程中指导农户，直至平台交易成功，做好库存登记。县域电商公司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科技全程跟踪监控产品到终端，并负责农产品包装、销售和互联网交易使用培训等。电商平台收取农产品利润的 15%作为管理费，经纪人收取 15%中的 60%作为收入回报。该模式不仅从源头生产上严格地把握质量关，还可以有效地整合农村社会力量，获得较好的效益。

四、创建“农工产业”体系

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总体为弱势产业，表现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相对滞后，工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农业与工业体系长期处于割裂的状态，还尚未形成完备的“农工产业纵向一体化”⁴。长期以来，西南大部分地处边缘、偏远地区的以高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色。1949 年后，中国最重要、最紧迫的是开始着力发展军事重工业，由此跳过农业、轻工业，直接办重

⁴县域电商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以电子化方式手段，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所进行的商务活动过程。“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可作为推进农村电商最合适的行政单位。

西南地区的县域电商多为 2015 年开始筹划、创办。

文中主要指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农业和工业系统的交融，如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工业。西南地区在全国步伐一致，如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展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均以重工业为首。90 年代以前，西南地区重、轻、农产业比例关系需进一步调整。90 年代以后，农业与工业体系的协同发展才受到关注，部分地区开始大力发展以种植业、养殖业为基础的加工业。总体来说，西南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条件，无法先地完成传统农业向工业体系纵向融合发展，“农工产业体系”起步相当晚。现阶段，除四川外，其他四省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产值均较落后于中国东部、中部地区（见表 2）。

表 22015 年分地区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排名	汇总企业数 (个)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税金总额	
			累积值（亿元）	增速（%）	累积值（亿元）	增速（%）	累积值（亿元）	增速（%）
全国	78427	193689. 3	5. 0	12908. 0	5. 3	12269. 6	5. 0	
四川	6	3453	9140. 2	5. 3	597. 4	1. 3	558. 5	-1. 3
云南	20	1108	3046. 1	10. 9	337. 4	15. 7	1028. 3	3. 4
重庆	22	1041	2389. 9	10. 3	176. 6	10. 4	202. 0	0. 9
贵州	23	959	2053. 4	12. 6	354. 0	1. 7	397. 8	5. 7
西藏	31	31	37. 0	-7. 6	9. 8	-4. 9	3. 0	-16. 9

数据来源：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2016 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第 23 -24 页。

近几年，西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产业优势，如云南的烟草制造业，贵州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但这些产业大多尚未成为全省的经济支柱，一些具有全国性优势的资源远未得到应有的开发。如上文所述的“森林-山地”技术在衰退，相关的木材加工产业等也相当滞后（见下页表 3）。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部分地区只是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经济，缺少本土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户只有将产品全部贱卖给外地的深加工企业，没有议价权，随行就市，利润都被外地企业赚去，增产不增收。部分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农副产品加工业，但总体质量、效益不高，带动能力欠佳，加工业产业结构与当地种植业的类型、规模不匹配，企业规模偏小，技术、管理水平较低，品质难保障，内生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绿色品牌加工产品发展比较滞后。

表 3 2016 年按地区分组部分加工业当年价格销售产值（亿元）

地区	农副食品加工业	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全国	68857. 76	19034. 28	8855. 8	15119. 70	8826. 79
西南地区	31464. 82	4511. 07	2190. 5	741. 52	685. 42
重庆	1052. 97	225. 66	129. 09	101. 73	87. 36
四川	2928. 88	2925. 88	190. 83	381. 73	546. 90
贵州	379. 89	1029. 79	341. 25	187. 00	46. 75
云南	738. 73	303. 12	1529. 33	70. 51	4. 41
西藏	4. 35	26. 62		0. 5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2017 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第 372 -420 页。

以西南地区的M县为例。近年来M县政府招商引资，在城郊建立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但加工厂的持续性发展困难重重。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工厂与当地的“森林-山地”资源、种养殖业规模极不匹配。如2014年M县某乡镇成立了芭蕉芋生产合作社，达到近5000亩规模，到了收获季节，当地加工厂设备只进行面粉加工，不加工当地的芭蕉芋。生产合作社只能另外寻找市场，最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广州某加工厂加工成淀粉出口。2015年，M县农户见芭蕉芋加工厂难寻，经济效益低下，纷纷砍掉芭蕉芋，从此再不生产。2016年后，政府引导创办的农副产品加工厂多亏损停办。如今工厂厂房被保留下来，仅作为应付上级政绩检查的“临时道具”。

虽然现存的问题较多，但“农工”产业体系的意义不容忽视。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规律来看，发展农工产业体系恰到好处，不应过分追求高精尖的产业布局。尤其像云南、贵州等工业发展较不充分的省份，以资源初级加工产品及轻工业产品为主的工业门类仍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有些地区盲目效仿沿海地区的高科技工业，建立大量新的厂房，进行工业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比拼，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办好符合当地的“农工”产业体系。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如果当地的农副产品能得到帮助进行第一阶段的加工，那么他们就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这样既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也有助于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西南绝大多数劳动力对传统技术、生产方式更加熟悉，或许他们较难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却完全有能力成功参与到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农工”产业体系中。在工业发展不充分，资金不足，劳动者素质偏低的情况下，创建“农工”产业体系，更能助推欠发达区域现代转型、后发赶超，这一点也符合中央对西南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那么如何创建“农工”产业体系，推进西南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首先，“农工”产业体系将基于家庭农场、合作社这样的主体组织形式。小农户因为生产经营规模有限，资金、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客观条件限制，与“农工”产业体系难以有效连接。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等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能够有效带动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这样，组织起来的小农便可以全面借助现代产业发展契机实现价值增值。其次，根据区位的差异，在城郊可引导发展农产品集聚加工产业，打造产业发展集群。加工产业集聚规模和效率直接影响区域发展水平，可有效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便于治理企业污染物。沿海地区的发展实践也充分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是产业集聚较为明显的地区。在相对偏远地区，鼓励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电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培育发展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加工模式以弥补区位优势。再次，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和多业态形式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网络化延伸，如与旅游、休闲、文化、教育、科普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最后，推动产业向“产品+服务”转变，积极推进加工体验、个性定制等新产业、新模式。

发展“农工产业体系”有两个关键点：绿色与品牌。西南地区因保留了较好的生态传统，绿色产品加工业可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目前，绝大多数绿色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分布在东部和东北部各省区，从数量、产量和生产面积来看，东北三省、内蒙古等最大。从加工产品的质量方面来看，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占有较大优势。西南地区相对滞后，其中，以贵州、西藏最为薄弱。在继承生态传统的基础上，西南如果能稳步推进这项产业，将绿色农业发展列入扶贫优先方案，对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环节予以税收优惠等，可以大大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带动地方经济。“绿色”不仅指产品，也指加工过程，农副产品加工过程需实现零污染，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创建绿色加工体系，鼓励低碳、低耗、循环、高效的发展模式，推出一批绿色加工先行区作为样板推广模式，可实现增效增绿增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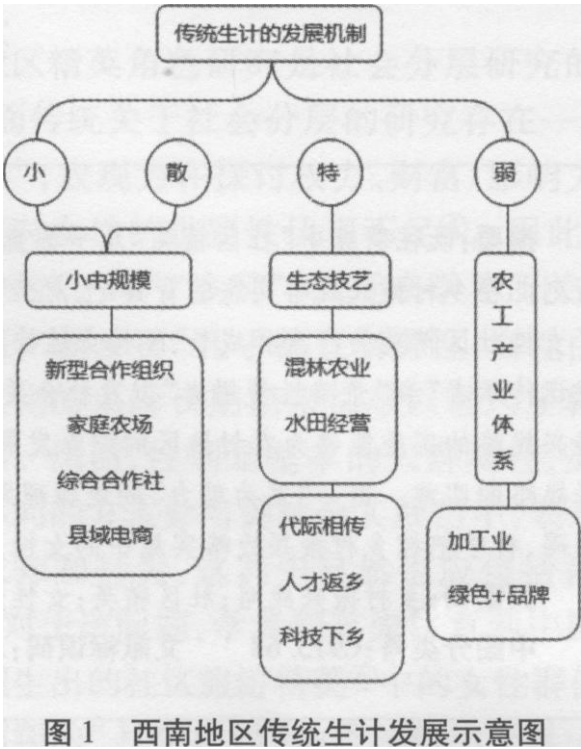
打造西南地区一批重点农业加工品牌。西南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大都藏在“穷乡僻壤”，长期依赖走“批零”渠道，没有品牌意识，也不享受品牌溢价，实属可惜。现中国农业发展已进入品牌竞争阶段，品牌效益炙手可热。从企业来说，培育品牌既可以展示自身独具的品质，提高竞争力和知名度，也可以创造比较高的经济效益。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收入的逐步提高，消费者对于品牌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如能及时把握消费需求的变化，合理引导、培育农副产品品牌市场，可以促成经济、社会、生态共赢的良好局面。农业品牌创立需要时间积淀，短则10年，长则20-30年，甚至更长，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是短平快的生意，短期投资很难有高回报。还需要一支具有工匠精神的队伍，以及政府政策、制度的大力扶持和践行。

就西南地区的某一传统生计，结合上文所述，从技术、组织及产业的角度尝试提出发展机制。以梯田的稻-鱼-鸭系统为例。技术视角：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先总结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技术精华，如融合传统种养结合的“稻鸭共育”“稻鱼

共养”“稻田养鹅”等生产技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研究和创新技术，研究有利于梯田稻米生产的新型配套技术，丰富稻田产品类型，开发特色水稻品种、多种水产品、绿色蔬菜等。组织视角：适时成立家庭农场、合作社、电商等新型合作组织，可借鉴综合性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系统的案例。最大限度地限制农户将水稻田改作其他农业用途，进行稻作景观保护。形成良好的管理制度，搭建广泛的市场渠道。产业视角：创建生态农业产业链，根据市场需求，实行综合利用和深度开发（深加工）相结合。利用生态农业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开发认证生态产品，以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这一思路大致呈现出本文传统生计发展机制的基本脉络。

余论

西南乡村地区的发展正处于千年变局的关键时期。小农经济形式的传统生计比重依然很大，这无疑成为西南农业地区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如何发展？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回归到传统农业的粗放时代，也不能釜底抽薪，全盘抛弃绵延千年的传统内核，更不能走西方现代石油农业的老路⁵，而应该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用一种新型的中间技术来发展传统技术，用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方式来创建村社共同体，并用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来组织生产新型的生产结构。基于村落传统，激发传统潜力，补足劣势，转化为优势。进入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走符合西南特色的农业生态现代化振兴之路。图 1 即为“家庭农场”替换“中农”后的示意图。



综上，传承森林梯田技术，其中的混林农业、水田开发等均需要重新获得重视。当地民族要有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代际相传传统农业文化技艺。主动挖掘传统技术中的经济价值，让传统文化扎根于经济效益良性运行的土壤。在农村经营外流的背景下，要鼓励人才返乡，发展本土技术。另外，在科技下乡的过程中，政府要缝合传统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的鸿沟，形成中间技术。发展新型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合作社、电商平台进一步把农户组织起来，既可以解决农户的技术改良问题，也增强农户走向市场的能力。创建农工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打造绿色品牌加工业均是未来的可行之路。不仅可使

⁵西方现代石油农业为前车之鉴，这种能源农业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之上，以输入的石油能超过输出的食物能为基本特征，打破了封闭式农业循环生产力，制造出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得产品附加值有所提升，也能真正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给予西南地区广大普通农村以新的出路。希望这些机制可以帮助优化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特、小、散、弱”的格局，实现农村区域的生态现代化转型。